

平安

書

黃宗英 著

東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鹏鸣

装帧设计:李伯红

版式设计:诸晓军

责任校对:常再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平安家书/黄宗英著 .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1

(三情书系)

ISBN 7-5060-1287-1

I . 平…

II . 黄…

III .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I267

平 安 家 书

PING'AN JIASHU

黄宗英 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建筑工业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092 毫米 1/32 印张:6.875 插页:2

字数:149 千字 印数:1-4,000 册

ISBN 7-5060-1287-1/Z·113 定价:15.60 元

序

卫建民

四年前，当《半山半水半书窗》出版时，黄宗英老师曾写过一篇言简意赅的自序，相当全面地向读者介绍了她为什么写作，怎样写？像戏剧的“自报家门”。

四年后，她又有一本新的集子出世，按惯例，书前要有一篇序；但这篇序文的作者，她和出版社却执意要我来担任。我明白，我们这班人，主要是黄宗英的读者而不是她的观众，“论资排辈”，真有那么点资格谈论她的文学作品——不管是以读者的身份，还是以司仪的面目，我都敢对她的文学作品发言。

不过，现在还不是全面谈论她的文学成就的时候——因为她还在写。她在四年前那本集子里的自序，正好启发了我，使我更靠近作者的文心，了解作家这种智力活动的堂奥。我发现，除了“接着说”，再也找不到别的切入点。

在那篇“自序”里，她说：“我是一名没想当作家的作家。演着演着戏，觉得演员的生活比戏里还有戏，就拿起笔来写了。”这句平平淡淡、如实招来的话，其实正道出了文学艺术的源泉。“没想当作家”，从没明晰的目的和担承，但内心情感的丰满洋溢已从舞台和水银灯下得不到释散——职业限制了性灵；于是，她拿起笔来，像拿起情感的导管，将生活中的观察和思索倾泄在一纸空白上，然

平安家书

后舒腰展臂，偷偷一笑，像刚经历了一次幸福的体验。

现实生活的丰富莫测，远远高出已成型的文艺作品。她从演艺生涯中得不到满足，转向描写演艺从业人员的生活；当演艺圈的所有生存状态都不能使她满足时，她的笔触就延伸到更广阔现实生活，恨不得把自己感受的一切新人新事都在现场报道出来，快速告诉读者她的新发现。当“报告文学”这种体裁尚未与“广告文学”划等号时，她黄宗英就用这种便捷的武器冲锋陷阵，为新事物大喊大叫。在文学界和读者群，黄宗英的名字是与报告文学联系在一起的。

从小到老，她对未知领域里的好奇，既决定了她的个人性格，又影响了她的生活轨迹。她在少女时代登上话剧舞台，与其说是投身“进步文艺”，不如说是好奇心的满足。及至白发满头，她仍上山下海，入藏出洋，“望长城”，“第一次上热气球”，……仿佛每一天都有新生一般的快活，每一天都会有不确定的幸福等待。她是作家，更是一位“行为艺术家”；她对几位科学家的追踪采访，早已超出文学圈子，成为作家良知和责任的典范。同时，在与高尚的群体以心换心的过程中，也不断提升了她的精神境界。她曾文诌诌地说：“人群是一个大的磁场。当你熟知的朋友们揽辔高高翱翔，你也就不能勒马收缰。”

黄老师少小离家，没条件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她的文学创作，更多地是来自生活的直接感受而不是书本里的苦思冥想。蜜蜂是如何采花酿蜜的，她就是如何采访创作的。到了老年，她还想上大学，学外语，并不是要拿什么文凭和学位，还是因为对知识的好奇。她承认她的作品“没文法少规矩想写就写”，正说出了她的作品的特点。她的写作，就像她的说话，有独特的语言组合，往往

序

在懵懵懂懂的状态中流露出真诚和灵气。活了七十多岁，她不知“世故”为何物；她的作品，自然保持着那颗未放驰的本心。“学问之道无它，惟求放心而已矣。”文学创作，何尝不是“求放心”？

近年，她的创作数量不丰，除了健康的原因外，主要是“咽进去的比说出来的多得多”。过去，她写了那么多的人和事，在读者中产生广泛的影响，但还有许多宝贵的矿藏，她一直埋在心里，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可以告诉读者的是，本集四十几篇作品，绝大多数是未曾结集的新作。“平安家书”，原是在《新民晚报》开设的专栏名称，今移作书名，算是作者对读者道一声吉祥吧！

在动荡不安的世界，谁不盼着一封“平安家书”？

一九九九年岁末于北京报国寺顾祠

目 录

序	卫建民(1)
如烟往事	(1)
童年的七零八碎	(3)
我上大学	(10)
我上大学之后	(27)
人间烟火	(32)
大礼谢饭	(40)
宁穿破,不穿错	(49)
但愿长睡不愿醒	(53)
中国西藏山川植被	(72)
第一次上热气球	(75)
原本是可以笑的	(80)
平安家书	(85)
我活着哩	(87)
水仙·我俩·他们	(89)
贺韩美林娶妇	(91)
馋	(93)
谢谢翻译家们	(95)
涌涌红杜鹃	(97)

心到就好	(99)
匆匆一掠中州	(102)
我嫉妒	(104)
我被叶君健吓着了	(107)
夏练三伏之乐	(110)
冬草之歌	(112)
有病不呻吟	(115)
开学了	(117)
子夜续读	(119)
美的圣殿	(121)
敞开心扉的栖憩地	(123)
一朝点火	(125)
灵感来时	(128)
致季羨林先生	(132)
附 赠宗英兄妹	(134)
人物杂记	(135)
快乐的阿丹	(137)
阿丹活了——无罪终成碑 有泪不轻弹	(151)
星	(155)
洪娘娘	(168)
想你，阿胡子！	(175)
喜遇燕子	(181)
思三哥——唐纳	(184)
我亲二哥黄宗淮	(188)
徐迟绝响	(196)

盈盈望望舒	(200)
何人不敬董乐山	(204)
闲说亦代	(207)

如 烟 在 事



如果人人都早就知道

.....

果真都早就知道

.....

那么“文革”

.....

以后.....

以后.....

我醒了吗？

我的同胞们醒了吗？

——黄宗英

— 平安家书 —

童年的七零八碎

我没有专门回忆童年的文章，现在将散见各处的片断集在一起，姑且称之为“童年的七零八碎”吧。

七岁看大

1925年我出生在一个温馨而自在的家庭。父亲是总工程师。我有两个姐姐两个哥哥两个弟弟。我母亲是姐姐们的继母。我九岁丧父之后，两个姐姐帮着撑持家庭，并且把我这个丑丫头打扮得花蝴蝶似的，我从亲戚、邻居夸我姐姐的话里才知道这关系的。我总觉得我们家无所谓“家教”。爸爸活着的时候老没大没小地撺掇着我们上树、爬墙、还拿他当大马骑，并常年在戏园子里订包厢带全家看戏，孩子们在学校里开同乐会演戏、演讲、跳绳……爸爸都是最佳观众“追孩族”。父母从没说过一句让我们好好读书的话，却一个书库、一个书库地给我们买书：《万有文库》、《中学生文库》、《小朋友文库》……连描金漆绿题字的玻璃橱门的书架子一起买回来（真格的，现在讲究高消费了，倒连买个书架也费劲了）。姐弟办起了“我们的图书馆”，还刻了章。我最喜欢整理书架，把书摊一地，慢悠悠半懂不懂地一本本看过去。爸爸留给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我们家从北京带到青岛去的王厨子患败血症暴卒于医

院，爸爸说他是为我们家死的，出大殡时爸爸披麻打幡，我们全家白衣送丧厚葬于当地德国公墓。

谁善待过我们家，我们都不会忘记，虽说俗礼答谢修书叩安这一套总记不得。

“七岁看大”这句话对我不是没道理的。我仿佛从未逾越过“家庭熏陶”这个圈儿。大哥宗江把痴迷于戏剧艺术的圈给我套上，妹子我也受下了。其实，1940年我15岁踏上话剧舞台，只因我父早亡，家道中落，孤儿寡母日子过得凄清，我小小年纪整日做着养家孝母供兄弟上学的梦。我梦着去当护士，母亲说当护士太苦了；我梦着去当文书，因为家里有英文打字机，我会打字，可人家嫌我小；梦见卖花，因为“小小姑娘清早起来，提着花篮上市场”的歌儿好听；梦见吆喝着卖菜、摇拨浪鼓卖针头线脑……反正自始至终没做过当巨星、当文豪的梦。

童年对我影响最大的人

爸爸。好爸爸！爸爸是电话局的总工程师，人家都叫他老师。他却是孩子们的朋友和奴仆。他早上9点上班，可天不亮就起来，笑眯眯看我们一个一个背着书包走出家门，才又去睡回头觉。他总是带我们去看戏、去游泳、去看灯、去放风筝……我小时候长得最难看，他就最疼我。老让我跨在他背上骑马马，转圈圈。我九岁时，爸爸病倒了，说是伤寒。一天深夜，我从热被窝里被叫起来，只见楼上楼下，每个房间的灯都亮着，我被领到爸爸的卧室，爸爸正被人架着在大喘气。（长大后才知道是抢着他断气前给换衣服，不然到了阴间是赤身裸体的鬼！其实爸爸才不信鬼。都是好心人

如烟往事

瞎操持。)我觉着爸爸睁大眼睛看了看我,我叫爸爸,爸爸不应。大人叫我跪下,我不明白。从来是爸爸朝我下跪,让我骑,骑。干吗这回要我跪?又不是过年!等大人把我按得跪下来时,只听得母亲爆发出撕心的号啕。秋雨击窗,秋风浸骨,我的马自己跑了。我从此没有马骑了。……

再有,是我大哥宗江。他老是干些我想不到的事,我最疼他。他13岁时办了个正式式的铅字印刷的报纸——《黄金时代》,我只得投稿。他到上海演话剧,我也就跟着上了台。他恋爱,我就用才学的英文打字的本事,帮他打那长长的、我不太懂的情书。他游海外,我就替他承担长子赡养母亲、扶持兄弟的责任。青少年时期,我们从不谈心,却彼此了解、笃爱。而今,年龄愈增而弥甚。

再有,当然是老师啰!我最喜欢上具有老师风度的女老师的课,目不转睛地望着她。还喜欢摇头晃脑拖长腔抑扬顿挫地教古文的长髯老先生。老先生给我们上《祭妹文》,老泪扑簌,痛哭掩涕。他的认真,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他伤心得好像是自己的妹妹死了。当时,我还想,我若死了,我哥哥也会写一篇很好的《祭妹文》;或从此把笔扔了……。现在,他祭我,我不忍;我祭他,他可能“笑场”。(每次,我一本正经对他,他都“笑场”。)还是暂时谁也别祭谁,多写些让大家都哭的作品吧。

再有,再有:可多啦!不一定是哪一个人,可影响之深之久,毕生不忘,像颜色掺在了酒里,捞也捞不出,挥也挥不去,那是国破家亡的耻辱。(我小时候,每年要过多少个“国耻纪念日”啊!)是水旱灾害频繁的国土,逃荒的人群、漂来的尸体。是期待光明的希望。是解放的喜悦。是艺人改变社会地位的昂奋,是被“专政”的惊愕……呀,已越出童年的范畴;但政治上的幼稚,于今始终未能逾越。

我织毛线

我从小学着织毛线，并不是为着织娃娃裙之类弄着玩。爸死了，娘眼睛视力日益减弱，当年，我爸活着时，提倡“劳工神圣”“自己动手”，娘一听爸的汽车喇叭声，就去洗手绢，并常年给儿女们用钩针钩墨盒套。我们每个人上学都拎着变幻着不同颜色的墨盒套，同学们好眼馋。而今娘看字要把书报放在鼻子头上。两个姐姐一个在金城银行当簿记，一个在山东齐鲁医院搞社会服务，在天津树德里2号的家里除我之外，只有4个光郎头兄弟。我大约9岁时就用小竹针、乱线头，弯来扭去先织小围脖，后织毛袜子和无指手套了。挑针的时候就问问大姐。我大姐织毛线、裁剪衣服裙裤可真让我羡慕，她会用一只小圆盘盘做黄色的菊花，再用褐色线把一朵朵菊花用钩针连起来，连成一方方，做椅垫子、围挡，可好看，还给我钩成小背心哩！我跟姐学会绕菊花，可没学会钩。我来不及学钩花花，自打能熟练地织下针、不掉针，偶然掉针也能救起来之后，我就连忙上手给两哥两弟和自己织起毛衣毛裤来。不能说是织，是改，也就是补吧。上学的男娃女娃的毛衣胳膊肘先磨光磨破。先把小弟穿不下的毛衣拆了，再拆大哥、二哥、大弟的毛衣袖子，把线在椅把上绕成一绞一绞，放在温温的清水里浸一夜，第二天用利华皂片洗了，撑直晾干。再让老张妈（家里惟一“从一而终”的养老保姆）撑着，我学着大姐的样，把毛线绕成和仁立羊毛团绒似的带小辫的大小团团，把磨细了的线和断线头，一根根理好头，挽个结，备着续那织着织着发现一段不太结实的线，就捻上一截。是有计划的把左袖子的线换到右袖子一边，并把省下的零用

如烟往事

钱买四两(十六两秤)新线,换了领口和袖口;并从上衣腰际剪断一个瓣花针,抽出一根线,让两上针两下针的腰和身分离,从上往下结一段旧线,再结个新线的边。一件V字领镶深色新边的“新”的合身毛衣就穿在我大哥身上,在燕京大学的校园里出风头了。大哥的换了左右袖给二哥,二哥的换了左右袖给大弟,大弟的给小弟,剩下的杂色线就给我自己织藏青色底、红一道、灰一道、白一道的花毛衣了。一冬的黄家五兄妹的毛衣织成了,而织手套是用旧线织边、新线织手巴掌和手指。袜子的后跟和袜头也用新毛线,还加根棉纱,以加强耐磨损度。寒衣齐备,开始用破碎旧布和薄浆糊打袼褙(硬衬),买青绒鞋面,青缎滚条,做蚌壳棉鞋等过年时穿了。我们兄弟姐妹日长夜大,学费水涨船高,1939年发大水之后,秋深,娘和我翻箱子,我找出大姐、二姐上中学时披的深紫红毛线织的大围巾,一条大概要用两斤半毛线,还新着哩。我一鼓作气全都拆了。大姐回家发了脾气,娘哭了。我娘是大姐二姐的后娘。(我没这概念,因为大姐二姐从来疼兄、弟、妹。)我也哭了一场,但这一冬,五兄妹全都穿上了紫红毛线不同花系列。——我少女时代的毛线活也到此落幕。

扁桃哥

十二三岁那年冬天的一个傍晚,我大哥的燕京大学同学扁桃哥来天津树德里2号我家,手心里攥着大哥写的一张一指宽的纸条,大概是随时准备吞进去。我和我娘一看这皱巴巴纸条上歪歪斜斜的“哥体”,就明白了扁桃哥要在我家藏一阵子。当时日寇正到处搜捕抗日青年。傍晚时分,我悄悄把扁桃哥领上二楼屋顶

平安家书

平台，我一边收衣裳，一边告诉他：“跨过木栏杆，3号里住着瑞蚨祥孟掌柜的七姨太，窑姐儿出身，是好人……4号是……5号是……，胡同尽头里篱笆墙大宅院里有大狼狗，这可是个死胡同……”我娘和忠仆老张妈把出了嫁的大姐的闺房门开了让他住，也不敢在那屋生炉子，晚上也不让他点大灯。扁桃哥白天在姐屋看书临帖，傍黑常在我娘和孩子一起住的大屋呆着，有时辅导我们做功课，帮我解那使我算术成绩开始下降的鸡兔同笼，我绕绒线的时候还帮我撑线。过了十来天，扁桃哥说要出去。娘叮嘱：“千万回来吃饭，千万。”扁桃哥回来吃饭时，告诉我们他明天走，我们也不问他上哪儿去。他走了。几十年后，造反派来外调，说的天津话：“你和大叛徒娄平‘吗’关系？”

“娄——平——？是哪个剧团的？是演小生的？”

“别演戏了。他根本不是唱戏的，他被捕后当了叛徒，混进冀东游击队，你会不认识？！”

“我是盘算过投奔冀东游击队，可我不认识也没听说过娄平。”

“你老老实实我们还念你在天津地界呆过；你不老实，证据可在我们手里！写交代！”

我把呆过的剧团里的角儿、里子、龙套想了个遍，想不出个娄平，只好说：“我只想出个陈平，演过皇帝……”

“谁跟你扯帝王将相那一套，你看！”“啪”的一声，一张四寸半身照扔在我面前，我一瞅：“唉呀，这是大扁桃啊！”

“什么桃啊柿子还大萝卜哩！交代你和他是什么关系？！”

我老老实实交代：“大扁桃学名陶声垂，因为脸生得像扁桃，外号大扁桃，我叫他扁桃哥，约在某年冬天……在我家藏了半个月……”

“没了?”

“没了。”

“签名盖章。”

我签了名：“我没章。”

他们取出印色盒：“按手印。”

“我不是犯人。”

“叫你按你就按！”

我想这是演的那一出啊，我别扭地用食指挖着印泥狠狠地按了一朵红。

后来——“文革”之后才知道，那年冬天，陶声垂与华北地下党接上关系，去了冀东游击队，解放之后，他任南开大学副校长。“运动”中，他的经历有半个月的下落“交代不清”，被说成是进了天津日本宪兵队司令部，投降后混进游击队……天啊，幸亏当时小小年纪的我还活着，而娘和老张妈早已阴阳隔界，若不是我的交代和他的交代相符，他这“半个月”是永远清不了啦。真是人生如戏若梦。